

包晓光 著

# 物性之维

人文精神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艺

WUXING ZHIWEI  
RENWEN JINGSHEN SHIYUXIA DE  
ZHONGGUO DANGDAI WENYI

 文物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成果


· WU · XING · ZHI · WEI ·

# 物性之维

人文精神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艺

RENWEN JINGSHEN SHIYUXIA DE ZHONGGUO DANGDAI WENYI

包晓光 著

 文物出版社

封扉设计：王 超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孙 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性之维：人文精神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艺 / 包晓光  
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3  
ISBN 978-7-5010-3355-3

I. ①物… II. ①包… III. ①文艺 - 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8881 号

**物性之维：人文精神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艺**

**包晓光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10 × 1000 1/16 印张：19.5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355-3 定价：58.00元

## 自序

2007年，我以“改革开放时期都市流行文化艺术生产与文艺思潮研究”为题，申报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的时候，都市流行文化与文艺思潮的关系问题正让我感到困扰。困扰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把1999年到2000年间发生的关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论争<sup>①</sup>视为文化界人文精神文艺思潮的余绪的话，那么，自那时以来的近十年时间里，在中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几乎没有出现过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文艺思潮。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体具有以往文艺思潮形态的也只有1993年到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虽然说是“大讨论”，但其规模和程度都无法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思潮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就其讨论的内容来说，文化界对人文精神的关怀与忧虑，恰恰同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或者不如说，这种关怀与忧虑恰恰是由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所引起并针对后者而发的。但是，从文艺思潮的研究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几乎形成了一个文艺思潮的空白地带，文艺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既空前地热闹，又前所未有地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因此，我们不免有此一问：文艺思潮是否已经在铺天盖地的大众流行文化中终结了？

第二，1992年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都市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特别是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种“新”有这样几个突出特征：一是流行文化波及的空间空前广大，打破了都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界限，在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打破了人群间因社会地位、文化地位、

---

<sup>①</sup> 所谓“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论争，是指发生于上个世纪末年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场学者之争。“历史理性”为陆贵山教授所主张，“人文关怀”为童庆炳教授所主张。具体内容及笔者的观点，详见本著第一部《人文精神、物性与诗学》中之《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新理性精神》一文。

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区隔，流行文化成了真正具有大众性的东西。三是从时间周期来看，流行文化的流行速度远超以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其实也有流行文化，比如八个“样板戏”，虽然由官方有意倡导，属于官方主流文化的范畴，但这并不妨碍全民接受和流行。只是它持续时间非常长，殊少更替，也缺少流动性。新世纪以来的流行文化真正具有了丰富性、多样性和流动性，转换更替的周期很快，如“超女”、“快男”、“百家讲坛”等等具体流行文化事态，其生命周期都很有有限。四是流行文化与新兴科技成果的普及息息相关。比如，电视的普及显然促进了电视娱乐类节目的生产并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照方式。互联网的普及则使网络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时尚的方式。手机的普及使得微博、即时上网、短信交流等时尚生活方式的大面积流行成为可能。博客、播客、拍客、微博等新兴大众传播方式把新科技与流行文化的关系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广泛的运用，使得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意味着，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流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也占有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第三，再来看看主体的问题。经历过 20 世纪 80 年代主体论文艺思潮的人文知识分子大都知道“主体”一词的特殊含义，给予主体真正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是那个年代思想解放的主要诉求之一。现在我们再来审视主体的含义，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主体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远非 1980 年代主体论思维所能想象和囊括。我们不能不承认，主体的范围空前地扩大了，在 80 年代主体论的意义上指称的主体，在今天的主体世界中只是一个很小的群落，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言说者主体的群落。我们今天也许能够醒悟到，原来我们所呼吁的那个主体，并不代表所有的主体，也不代表主体的全部。今天的主体，显然包括了很多阶层的自觉和自主意识，他们的文化需求并不一定都关注只有人文知识分子才会关注的事情。就某个具体的文化主体来说，它的存在也可能不再是单纯的、线性的、连续的，而是多维的、非连续的、非线性的，主体的存在可能分布并依附于某些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存在与过程之中。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世界空前繁复的时代，反而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主体的意义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意义因流变纷繁而成了一个瞬息变化的东西。适应这种变化，或者不如说是酿造了这种变化的，就是流行文化本身。

第四，我们再来看一看 1992 年以来发生的一些对文化主体具有特殊意味的文化事实吧。首先是文化与经济、特别是与都市经济相结合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发生在主体周围，而且就发生在主体身上。其中一个引人瞩

目的变化就是人文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与物质利益实现了紧密的结合。其次，熟知那些曾在文艺思潮中具有呼风唤雨之能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人都知道，现如今这些曾经的精英都在做些什么？固然有的人已经甘于寂寞并淡出公众视野，但是，更多的人或者做官、或者官学兼栖、或者经商、或者商学兼做。也不乏有人进入流行文化，在流行文化的热闹与纷争中，上下沉浮，展现自身风采。再有，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产业勃然兴起，文化消费成为都市经济中的亮点。在此情势下，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进一步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流行文化生产日益标准化、规模化、程式化。为了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流行文化不得不时刻追求新奇、搞怪、惊悚、滑稽，然后迅速利用流行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当流行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程式化的时候，新的创新必须周而复始。流行的周期越来越短，流行文化的规模越来越大，数量、样式越来越多，在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榨取社会文化资源、文化注意力和文化意义。更多的人力资源投入流行文化，也必然削弱人们对严肃文化议题的关注。

上述几点，是我在面对文艺思潮与流行文化关系问题的时候所想到的，当然原因肯定不止这些。正是基于这些想法，我才把这样一个选题作为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实际上这这也是一个反思性的议题。

历经三年颇为痛苦的实践、思考、研究，现在摆在面前的这个东西，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成熟的结果。之所以说不成熟，是因为对文艺思潮与都市流行文化艺术生产的思考不会有一个终结性的结果。我的看法只是说，改革开放前期的文艺思潮是一个历史的动因和结果。作为动因，文艺思潮有其思想解放、推动中国进步的意义，但是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作为结果，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消歇，有其历史必然性。固然不能说都市流行文化终结了文艺思潮，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一般大众的兴奋点转移了，为数不少的人文知识分子也投身于流行文化的艺术生产中，文艺思潮的传统议题也不再具有激动人心的意义。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文艺思潮本身也是一种流行，而今，这种流行更多的是在都市文化之中出现的，也许已经面目全非了。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文艺思潮，没有面面俱到，只是从人文精神的视角，试图构建一个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主体人的问题展开研究。其中的核心是分析文艺思潮中的物性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对物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旨和核心。物性的现实化过程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流行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当物性问题得到基

本缓解之后，文艺思潮就失去了内驱力。第二部分的主题是文化与主体。在这里，我重点分析了都市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小资产者阶层及其文化意义。作为都市市民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重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少流行文化样式，都是他们创造的。第三部分主要剖析了文化产业发展和都市化进程对文化生态影响的问题。在我看来，社会转型和城市消费社会的形成是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兴盛，是流行文化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流行文化和文化产业一起，进一步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本书的结构对本课题的思考来说，也是颇有意味的。如果以文化作为一个出发点，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化主体先是在诸种文艺思潮中与政治纠结，继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与经济中心融合，随后又在文化产业改革中，与流行文化艺术生产发生种种复杂关系。这看起来像是揭示了一个发展的轨迹。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轨迹，但是，终归还是说明了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给予文化的关键性影响。

## 目 录

|           |     |
|-----------|-----|
| 自 序 ..... | (1) |
|-----------|-----|

## 第一部 人文精神、物性与诗学

|  |       |
|--|-------|
| 引 言 .....                                  | (3)   |
| 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之提出与展开 .....                  | (5)   |
| 人文精神问题的内在切己性 .....                         | (11)  |
| 海德格尔的此在论方法、诗学途径与特里·伊格尔顿对此所作的<br>批判分析 ..... | (14)  |
| 黑格尔的巨大历史感及其启示 .....                        | (31)  |
| 马克思主义的诗学方法论原则 .....                        | (35)  |
| 方法论与框架性思想：人文精神的物性维度、神性维度、诗性维度<br>.....     | (44)  |
| 文学是“人学”吗？ .....                            | (55)  |
| 诗性证明的政治意涵 .....                            | (59)  |
| 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与认识论文艺观的关系 .....                 | (62)  |
| 艺术生产论文艺观与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物性维度 .....               | (69)  |
| 主体论文艺观的诗性取向与物性冲动 .....                     | (75)  |
| 中国当代文学的物性论意义：情欲与现代化 .....                  | (81)  |
| 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向度与科技之维 .....                      | (92)  |
| 文艺学元理论中的人性、人道主义主题 .....                    | (102) |
| 过渡时期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与人道主义 .....                    | (109) |
| 过渡时期现代主义文艺创作与新人本主义“人学”观念 .....             | (113) |
| 市场化运动与“人文精神”思潮 .....                       | (117) |
| 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新理性精神 .....                      | (135)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历史意识 .....                      | (141) |



## 第二部 都市、阶层与文化

|                              |       |
|------------------------------|-------|
| 引 言 .....                    | (147) |
| 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语境与语义、阶段性与特征 ..... | (149) |
| 传统文化资源的取用与可持续发展 .....        | (175) |
| 改革开放与中国都市阶层分野 .....          | (179) |
| 都市消费与怀旧诡计                    |       |
| ——无视“历史”的浪漫箴言 .....          | (196) |
| 上海的宏伟叙事：怀旧 .....             | (198) |
| 世纪末温情                        |       |
| ——王家卫演绎的小资情感与怀旧故事 .....      | (201) |
| 张爱玲与布尔乔亚和上海风花雪夜故事 .....      | (212) |
| 陈丹燕怀旧系列文本分析 .....            | (221) |
| 旧上海的婀娜风情                     |       |
| ——郭建英图画的欲望世界 .....           | (231) |
| 网络文学——开在数字世界里的花朵 .....       | (237) |
| 关于雪村的音乐评书 .....              | (248) |

## 第三部 创意、世界城市、产业

|                         |       |
|-------------------------|-------|
| 引 言 .....               | (253) |
| 转型、消费、文化产业 .....        | (257) |
| 首都城乡结合部：环形地带的文化生态 ..... | (267) |
| 文化创意产业：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 ..... | (279) |
| 后 记 .....               | (301) |

# 第一部 人文精神、物性与诗学

---



## 引 言

本编的话题是“人文精神、物性与诗学”，话题的由来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运动关系密切。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的论断，对当时的改革开放局面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实际上，在邓小平发布讲话之前，中国的市场化运动已经颇有开展，改革开放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行程。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正名。这一“正名”来得非常重要，它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获得了“合法性”，为腾飞的中国经济装上了助推器。

“人文精神”的有关谈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一度高涨，文化理论界一些人士，围绕这一概念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见解。这些见解之所以激起比较广泛的响应，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变化息息相关。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经济、尽快富裕，逐渐成为全民性诉求和关注焦点，中国人的物性——物质生存问题得到高度重视。人们的物质欲望越来越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为了满足并进一步激发这一欲望，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也被越来越多地提供出来。

其次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方面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日益趋向经济建设中心，全社会的逐富心理和消费欲望推动了以都市为中心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与之相应，拜金主义日益泛滥，社会道德以及传统价值观念也遭到严峻挑战。

第三是文化结构与知识体系的变动与调整。文化结构与知识体系变化最深厚的根源是经济基础的变革，而直接导致这一变化的则是信息化时代的快速降临与普及。文化结构呈现为多元化、多态化，不同文化层的位置和功能变化也日益频密。知识体系变化非常显著，如人文社会科学在范式、对象、方法方面都有所调整，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学科间的地位变化也引人注目。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显学”之称的美学和文艺学，在

90年代逐渐让位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新闻学等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更为密切的学科。社会对厉以宁、吴敬琏们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对一些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关注度。而在80年代，这些热切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刘再复们的身上。

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起来有些无奈甚至残酷：一位哲学家、美学家或者文学理论家，如果想要引起公众的瞩目，就得在他的学问之外制造噱头，或者炒作自己，否则就要甘于寂寞。对于90年代参与人文精神话题讨论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人文精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噱头”，其中的一些人显然是另有文化图谋的。在那些颇为复杂的文化图谋中，存在着某种真实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试图复返或重构某种人文精神价值体系，以对抗主体精神的世俗化。正是这一部分内容，构成了本编讨论的中心。

“物性与诗学”，与“人文精神”话题关系密切。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所谓的“物性”。“物性”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新鲜，在西方哲学中，物性论有悠久传统。比如古希腊哲学中的物性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海德格尔的物性论等等。中国传统哲学中，缺少西方那样的物性论沉思，多的是对“德性”的思考，作为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一员，如何确认“德性”的标准，如何践行“德性”，如何在“德性”实践中由此及彼，推而广之，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近代之后，伴随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西方文明及其观念的渗入，中国人对“德性”的专注，逐渐让位于对“物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的表现尽管复杂，但是，究其根本，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主体本身的物性，另一个是对象的物性。当然，这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人本身的物性就是人的生命的本然性和物质性，虽然它以文化和文明的形式存在，但是，其本身的物质意义是不能忽视的。对象的物性是指人的实践对物的把握与驾驭，这种实践受到物的规约与决定。人通过实践将自然物质世界转化为自己的对象，这是一个生产和占有财富以及满足自身物性的过程。

我们看到，80年代以来，中国的物性焦虑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上，主要还是一个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诉求。在个体层面，则主要是个体生命感的自我觉知和对此的满足。新时期的文艺和诗学的主题变迁，实与这种焦虑的产生和演化有关。

## 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之提出与展开

21 世纪初期，从事理论思考和著述的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凭自己的思绪染上一种神秘的“世纪末”或世纪初的色彩。各种宏观的世纪纵览、百年回顾和对新世纪新千年的踌躇满志的展望，使人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极为独特的历史时刻，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这一点似乎格外显明突出。<sup>①</sup>

这种捉摸不定的“跨世纪”感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氛围，在此情境中进行理论的思考与写作常常面临双重危险：一种危险是受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自以为有理由有可能也有权力剪裁、修正、重写历史，似乎理论的阐释与书写无所不能，可以穿透一切谜题与困惑。这种自我膨胀的理论表述正是世纪之交中国精神世界的诸种症候之一，它的过度发展已经危及理论理性自身的尊严，使阐释陷入困境。另一种危险是受一种同样肤浅的悲观主义情绪的驱使，自以为有理由有可能也有权力将自己固守的立场与价值宣布为终极真理，似乎唯有自己才延续了传统的生命与精髓，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遗传密码。这种倾向常常流露出一种自恋式的悲观主义情调，其独断论色彩必然引起人们对其理论身份合法性的质疑。

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在当下中国思想界都正在受到一种“腐蚀剂”的侵蚀与消解，这种“腐蚀剂”就是被普泛化的解构主义。在

① 雅斯贝尔斯在谈到人们对现时代的态度时，区分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超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相信末日审判，认为尘世的生活毫无价值。另一种观点是“关于各种事件循环再现的思想，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思想，以及关于一个世界帝国的意义的思想”。他指出：“当这种超自然的观点转变成或被取代为另一种关于世界是一种运动、一种内在的进步的观点时（虽然关于人类历史的唯一性的观点依然留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就唤醒了这样的意识，即，他们自己的时代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同于在它之前的所有时代。他们终于为这样的信念所鼓舞：或许自发地、不可察觉地，或许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某种与以前不同的事物将从他们的时代中产生出来。”（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某种意义说来，传统与反传统及对这两种立场的解构构成了中国当下理论言述的内部循环，这种循环在中国市场经济运动中，衍生出大量的文本和附属精神产品，营造出一种炫人眼目的欣欣向荣。然而，事实表明，这一循环在精神方面甚少建构作用，更绝少贡献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灵感，相反，倒是日益助长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滋生与蔓延。

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通过置身于自身特有的生存境遇而置身于中国当代情境之中，通过置身于中国当代情境之中而置身于当代世界一般境况之中。这一与当前世界密切关联的现实之领会，使每一欲有所言说者不能不觉知因立于这一境况而涌现在他目前的种种影响的不可克服性，不能不感受到这种情境与境况日益迫人的压力。这些外部的因素与言述者自身的因素——这些给定之物与给定之思，既给思想者提供了空前繁杂的思维对象，同时又给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他落入阐释者的悖论与困境之中。这种悖论并非因思维的艰深或理性僭越本分试图掌握彼岸之物而产生，而是因为物与思、思与说、说与行的严重背离与断裂使阐释者的阐释常常陷于悖论。绚丽多彩的滔滔不绝之说依然留下不可克服的问题，阐释对“事情”本身的崭露只是标明了阐释者的某种“纯然客观”的立场，至于“事情”本身仍然在其居停之所安之若素。

当然，对阐释困境的这种评论也许是有欠公正的，即使是在西方，阐释者的立场由外部世界转向自身也并非一件新鲜事。阐释放弃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致力于“回到事情本身”<sup>①</sup>是西方现当代思维的一个主要趋势。在中国，阐释者的努力显然还无法回到“事情”本身，他的阐释的困境倒还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更多的倒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实践的问题。即如何弥合物与思、思与说、说与行之间的巨大裂隙。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世界，中国的当代之思所面临的境遇真的具有一种戏剧性，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

论说“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自然也面临着上述诸种风险，

① 胡塞尔认为，欧洲的精神危机状态是由于知识处在一个缺乏科学的基础的状态，缺乏科学基础的知识足适误导人们的精神。为了给知识以稳固的可靠的科学基础，就应当从既往的心理主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立场转到先验现象学的立场和方法上来。这种方法主张对客体的独立自在性问题作“存在的悬置”，对既往的思想观念作“历史的悬置”，这样一来才能“回到事情本身”。本文所说的“回到事情本身”，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某种状态或指向。90年代提出了一个“学理性”和“岗位意识”的问题，这似乎表明中国的知识层建构知识的科学基础的某种模糊的希冀。不过应当看到，即使是在学理层面上，实用的功利主义和波动的情绪也总是存在着，这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此，企望像现象学那样倡导“回到事情本身”，还甚少现实性。

这种风险由于论题本身的问题而明显地加大了。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某种超乎寻常的理论勇气，而是笔者所面对的给定之物与给定之思及具有的自觉意识使得这一论题展示出一种迫切性和非此不可性。对此的自觉在中国思想史上不是偶发事件，至少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90年代知识分子层都曾有过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sup>①</sup>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仍有理由问：将“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放在一起命名是必要的吗？这一命名岂非将两个含混不清的问题搅到一起了吗？看来的确如此。正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以往在此名称下书写的文学其实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内地汉族文学，台湾、港澳、少数民族文学是排除在“中国当代文学”之外的。<sup>②</sup>这一见解在更为准确地理解与定义“中国当代文学”，揭破以往用法中隐含的某种不公正方面，显示了一种自觉意识。这在“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意识中是难得见到的。不过，这一观点的似

① 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和过程之中是确实存在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是指“五四”时期人们眼中的“当代”，而非别的时候的当代。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小说界革命、文化青年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等等，都表现出这种自觉意识。“五四”运动巨匠们的文艺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的深重性。90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自觉更是不言而喻。

② 这种观点当以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的表述最为明确。在谈到流行的诸种“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时，该书作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指的是大陆五十年代以来的汉族文学，而把港澳台地区的当代文学和国内除汉族外55个兄弟民族的当代文学编入另册。人们都在说中国是完整的，但当代文学门类研究却是破碎和割裂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许只能称为‘半部’、‘多半部’而不是‘全部’。究其原因，是我们的研究往往受到泛意识形态、经验美学和自身视野狭小三种局限，从而难能展现全景，并在一个整体格局的背景下进行更深入的学理性阐发。”（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第4~5页）应当说杨匡汉、孟繁华等人主张和坚持“一个文学中国的立场”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愿望不能与历史和现实划等号。在他们所主张的意义上，“一个文学中国”的实现显然不能无视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现实的中国的实现。脱离这样的现实基础而主张“一个文学中国”，恐怕恰恰是一种“泛意识形态”的潜意识在作怪。应当承认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观念确实有其陈旧和过时之处，但是，同时应当看到，这种中国当代文学史之所以只能是“半部”或“多半部”，正是现实的中国的文学状况的反映，这与中国事实上处在尚未统一的状态是一致的。写作“半部”或“多半部”文学史著作的那些作者们未必不清楚中国是应当统一的，而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名目之下书写的文学史又只能是和必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学史，这一点毫不奇怪。杨匡汉、孟繁华等人虽然伸张少数民族的文学权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去深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发展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就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看法。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这部著作号称《共和国文学50年》，但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却少得可怜，连全书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是而非也显而易见。实际上，长期以来在中国内地，“中国当代文学”概念指涉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汉语言文学，这一点并无问题。汉语言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不是一个概念，汉语言文学既非汉民族的独创亦非为汉民族所独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语言文学已经成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华夏民族的共同财富。过分强调民族的差别，将长期生活在共有的历史人文情境中的不同民族的文学看得泾渭分明，这样做只会导致一种新的狭隘性。此其一也。我们又知道，“中国”一词的含义是极为丰富的，它不仅是在地域、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概念。“当代”一词同样具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含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当其与“中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们当然首先会将其理解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并不妨碍他们将台、港、澳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即使如某些学者所说，忽视了台、港、澳文学的客观存在，那么，这一阙失状态对“一个文学中国”之虚妄的昭示也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一词的疑虑尚不止此，“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汉语言文学”的意义是明确的，这一命名虽然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什么“文化霸权”。即使在当下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视角”，是一把宜用的尺度。<sup>①</sup>

对思量中国当下人文精神问题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之不确定主要在于它之进入或出离“当代”视域的方式与姿态。既往文学史常常将“当代史”看作一条有着一个明确开端的正在向一个预期的端点前进的线段。一旦达到这一端点，当代史就将遭到与以往历史时段相同的命运：两端固定，打上封条，成为一部完整的盖棺论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说来，这种文学史观对于把握和书写某一确定时间内的文学现象文学事实也许不无益处，但是对于意欲真切了解当代生存着的文学中最为鲜活的思想的人来说，这种文学观就不仅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了。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应当是在当代情境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学精神、文学现象、文学理念，它应当是被人们阅读、欣赏、思忖、打量与评说的自为存在，应当是当代精神的诗性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文学”，它的“两端”就不是固定的，边缘就不是轮廓分明的，甚至也不是想象中的在物理时空

<sup>①</sup> 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洪子诚认为：“以当初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分类方法，把‘社会主义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质的规定仍是一种重要的理解。”他自己的这部著作仍然采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其中，“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没有受到忽视。